

# “绅”的嬗变

## ——《动摇》的一种解读

罗维斯

**[内容提要]** 《动摇》以一个小县城为缩影，刻画了民国初年激烈分化演变后的传统绅士阶层在国民革命洪流中不同的人生样态。小说中，传统绅士阶层上层的陆氏一门虽依旧保有诗礼人家的品格，却因不能适应新的社会体制而失落了既有的权力和地位；传统绅士家庭子弟革命者方罗兰通过接受新式教育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却囿于与基层社会的隔阂，而在县城展开革命工作时举措无当；出身于传统绅士阶层的胡国光，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通过各种投机钻营，成为继续控制地方社会的民国绅士，并逐步劣质化。《动摇》中这些对传统绅士阶层嬗变的书写蕴含了茅盾对传统绅士阶层的独特情结，这种情结也对茅盾毕生的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茅盾的首部长篇小说《蚀》三部曲之一的《动摇》，是鲜有的及时反映国民革命风貌的文学创作。这部小说触及了“他人所不敢而又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sup>①</sup>，又恰恰发表于国民革命失败这样敏感的时间段。作品问世以后，饱受左翼阵营文艺人士的激烈批判。面对攻击和质疑，茅盾的自我辩解依然陷于阶级观念的定则<sup>②</sup>，这便进一步坐实了《动摇》反映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事实。

建国以后，大陆学界对《动摇》等作品的解读，承继了左翼文艺批评的基本观念，并进一步强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色彩。小说中的方罗兰等革命者往往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还对接上了国民党左派这样的党派立场。他们在革命中的举措失当也被视为了阶级缺陷和党派弱点的体现<sup>③</sup>。而小说中反面人物代表胡国光则被视作“集中了定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种种不可告人的恶德”<sup>④</sup>，是与革命力量相对立的封建势力。

新时期以后，学界对曾经“唯此独尊”的阶级视角与分析方法进行了深入反思和全面否定。茅盾的小说创作一度被视为生动展现社会各阶级斗争风貌的力作。然而，随着“阶级论”在文学

研究阵地的失守，文学研究回归审美性成为新的主潮，茅盾作品也逐渐遇冷，甚至曾被一些研究者剔除出现代文学经典之列。

近年来，随着海外汉学对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影响的增强，茅盾笔下旖旎艳丽的时代女性所体现出的“现代性”，取代了民国社会激烈变革、冲突中显现的“阶级性”，成为国内茅盾研究的新特点。有学者开始关注小说中“女性指符”与男性作家“革命想象”及“时代性”意蕴之间的关系<sup>⑤</sup>。

诚然，对《动摇》充满阶级对立和党派色彩的解读是以政治属性代替了小说人物形象的丰富性，陷入政治窠臼而流于刻板；而对《动摇》中现代性的阐释却因对外来批评概念的放大化使用而往往流于片面，这都在不同程度上模糊了茅盾呈现社会历史演变的执着努力。

这两种对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影响至深的解读模式，都遮蔽了《动摇》呈现的“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sup>⑥</sup>，脱离了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单一的“阶级论”和概念式的“现代性”这样的“舶来品”都不能准确解读茅盾刻画的民国时期人物形象。以美国汉学文论的新标签取代苏俄社会政治话语的旧标签，并不能对

茅盾研究有实质性的推进,而只是使我们的研究从政治高压下的学术失语走到学术自身的失语。

一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几乎全部的茅盾小说,都有这么一个自觉意识到的政治革命或社会变动的背景。”<sup>⑦</sup>《动摇》正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动摇》中茅盾所着力呈现的国民革命时期的社会风貌中去,重新认识和解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深化对这部小说及茅盾整体创作的认识。

那么,茅盾究竟是从怎样的角度来揭示这一社会变动的?如果不是简单的阶级论,又是什么呢?

新时期以后,尽管学界逐渐摒弃了秉持阶级论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曾大行其道的小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这样的概念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清理。至今还有不少研究者受到这些概念的影响,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使用这些概念。而这些外来概念在描述《动摇》等现代文学作品时,却往往无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相契合。

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ie*)这个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概念,是一个经过日语、法语、俄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媒介传入的外来词汇<sup>⑧</sup>,其内涵经历了由模糊、多义到概念固化的过程。在革命文学兴起之时,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更多地指向对经济地位的描述,其所指也十分宽泛。不仅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茅盾称“几乎全国的十分之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sup>⑨</sup>,政治家毛泽东也认为“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sup>⑩</sup>。

而建国后相关研究所使用的“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则更偏向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划分。即将小资产阶级视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并直接与知识分子身份相等同。相关研究使用的“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和茅盾与革命文学派论争时的“小资产阶级”,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差异。这也就使得现有研究的许多结论变得十分可疑。因而将《动摇》中以方罗兰为代表的革命者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加以讨论,显然并不可取。

至于所谓的封建地主阶级,虽然我国早就存在地主这样的称谓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生产形式,但封建地主阶级作为对经济和阶级属性的划分,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才出现的。封建地主阶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阶级”<sup>⑪</sup>。可是,《动摇》中反面人物胡国光的塑造大都是通过他的政治活动来完成的。关于他的叙述中并没有任何经营土地、剥削农民的表述。封建地主阶级这样的概念显然无法阐释这个活跃于民国初年地方政界的人物。

事实上,我们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认知大多来自于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阐释和建构。而我国传统社会业已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社会政治结构描述体系。《动摇》所表现的也正是民国初年和国民革命时期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转变。因此,我们有必要返回具体历史情境,以中国社会自有的社会阶层概念重新描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在《动摇》中,茅盾对人物的身世背景做了明确交代和细致暗示。这部分叙述正揭示了作者对于人物身份属性的认识。这些人物的身份属性共同指向了一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延续千年、建国后逐渐消失的阶层——“绅士”。

绅士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类常见的人物形象,乡绅、士绅等称谓也常被用来指称这类人。而长期以来,学界一直缺乏对绅士阶层人物形象谱系的认识,绅士总是被简单地与地主阶级画上等号,而对“绅士”的内涵却一直缺乏基本的考察。

在“绅”的身份认定上,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对这一阶层也有绅士、士绅、乡绅等不同称谓。但中外学者基本上一致认为传统的“绅”这一阶层,是由退居乡里的官员、拥有科举功名者及其亲眷构成<sup>⑫</sup>。鉴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专著、国民革命时期的各类文献以及茅盾自己的小说文本和回忆录等都采用了“绅士”这一称谓,下文将统一使用“绅士”来指称这一阶层。

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下层的绅士是由以“正途”的科举考试或者“异途”的捐纳获得较低等级功名者组成。上层的绅士阶层则由在科举正途中递升至较高功名,或是有仕宦生涯者充任<sup>⑬</sup>。在传统四民社会,绅士阶层是中央政权与地方社

会的中介。绅士阶层一方面是国家官员的后备力量,以国家意志管理地方事务;一方面又代表地方和平民阶层与国家官僚机构沟通。“绅”与“民”之间界限明确,是一个有着独特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特权阶层<sup>⑥</sup>。

尽管绅士阶层往往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但是“绅士之所以为绅士,并不是由于其必然的占有多少土地,而是由于其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sup>⑦</sup>。单纯依靠占有土地的地主不但无法享有绅士的地位和特权,也不能参与地方行政,在社会实际生活和户籍制度中,与庶民同列<sup>⑧</sup>。将绅士定性为封建地主阶级显然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不符。

在清季民初的现代化进程中,绅士阶层随着政治权利结构的转型发生了剧烈的演变分化。《动摇》中的人物形象所展现的正是国民革命背景下,传统绅士阶层的嬗变。

## 二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绅士作为传统社会特有的政治精英阶层往往处于时代变革的风口浪尖。清季改良革新运动中,绅士阶层被视作“兴民权”和救亡图存的中坚力量<sup>⑨</sup>。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绅士阶层又成了各地光复的主要参与者。在国民革命这场政治权利再分配的政治军事行动中,与政权密切相关的绅士阶层又再次被推到了历史前台。国民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绅士阶层是革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强大既有政治势力。“在是否需要征税,是否需要建立政权机关等问题上,这些绅士都是活跃分子。……应当指出,青年学生也都出身于这个阶层。其实任何想上台执政的人必然有求于这些绅士。绅士在国民党里当然也占很大比例。……在出头露面的地方,到处都有绅士在活动……”<sup>⑩</sup>

茅盾作为深入参与国民革命工作的政治家,绅士阶级显然是他必然关注的革命对象。而对于小说家茅盾来说,要实现以《动摇》展现国民革命整体风貌的创作初衷,绅士阶层则同样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小说中,国民革命时期的社会乱象也正是在传统绅士阶层嬗变的底色上铺展开来。

传统绅士阶层在民国时期的嬗变所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与对话。在茅盾笔下,这种嬗变表现为了三种不同的样态:一部分传统绅士在新兴的国家政治体制下,虽谨守正派绅士的道德节操,却丧失了参与现代政治的能力,失落了以往的特权和地位;一部分传统绅士家庭子弟则通过接受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式教育,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但这一新兴的社会精英阶层却疏离了先辈曾牢牢把控的基层社会;一部分传统绅士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的政治变革中投机获利,继续充当地方政治的实际掌控者,并逐步劣质化。茅盾所亲历的社会风貌也正是在传统绅士阶层嬗变的三种样态中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在清季民初社会政治的剧烈震荡中,传统绅士阶层的部分正派绅士逐渐疏远了地方政务。这种现象为国民革命时期基层社会革命工作的开展埋下了重大隐患。在《动摇》中,除了革命者与劣绅的对阵之外,作者用了有别于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叙事节奏来描述陆氏一门。

陆家小说中一出场就显出高门大宅、名门望族的气势。陆府位于“县城内唯一热闹的所在”<sup>⑪</sup>,坐落在以陆家姓氏命名的陆巷。陆府门前挂着“翰林第”的匾额,府内则是个三进的大厦。陆氏先人在前清极为显赫:“陆家可说是世代簪缨的旧族。陆慕游的曾祖是翰林出身,做过藩台,祖父也做过实缺府县。”<sup>⑫</sup>清代,在科举殿试中获得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翰林作为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金字塔形人才排列的顶类层次,备受世人的青睐与推崇,对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sup>⑬</sup>顶级科场功名和高层仕宦生涯使陆氏一门获得了绅士阶层上层的尊崇地位。

此外,有学者曾测算,19世纪晚期,绅士加上直系亲属,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2%,但却获得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4%;绅士人均收入为普通百姓的16倍<sup>⑭</sup>。陆氏一门这样的绅士阶层上层,不但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而且持有大量的社会财富。陆家就在县城最繁华地段有显赫府邸。小说处处在细节上凸显陆氏高门巨族的旧式繁华。我们大可想见这曾经是一个怎样富贵双全的望族。

《动摇》中的陆氏一门被塑造为了充满旧式风雅气息的贵族之家，是过去一个时代的缩影。茅盾以典丽古朴的语言风格和舒缓绵长的叙事节奏，塑造起一个正派传统上层绅士温文尔雅、正直豁达的形象，建立起高门巨族诗礼美德的传统氛围。

陆三爹之父在任时“着实做了些兴学茂才的盛事”<sup>②</sup>。秉持圣人之徒理念的陆三爹也一直恪守祖业，不慕荣利，怡情诗词，有着旷达豪放的名士风流。他身为词章学大家，多有门生是县里颇有势力的正派人士。面对诸如婚姻自由这样的新派观念时，他也体现出了传统正派绅士阶层的开明姿态。在对待穷苦民众方面，陆家的大宅让乡下贫苦的本家住着，陆三爹也曾帮助过穷无所归的乡下女子。他的女儿陆慕云孝养老父，操持家业，有着世家闺秀的温婉与才情。面对革命乱象和自身危急处境时，这位出身于上层绅士家庭的闺秀，表现出了较之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时代女性更理性沉稳的气度和从容不迫的胆识。即便是陆家的不肖子陆慕游与一脸奸猾的胡国光和满身俗气的王荣昌并站一处时，“到底是温雅韶秀得多”<sup>③</sup>。小说中还多次借他人之口，说陆慕游的胡作非为只是受人愚弄，而他的本性还是到底不坏。足见作者对这个名门子弟的偏袒。

然而，小说在彰显陆府簪缨之家的贵族气质时，又不断暗示陆氏现下的落寞。陆府的古色古香是充满“伤感”的。“折桂”有科举高中之喻，而陆府“正厅前大院子里的两株桂树，只剩的老榦”<sup>④</sup>，无花堪折。陆府中的腊梅“开着寂寞的黄花，在残冬的夕阳光下，迎风打战”<sup>⑤</sup>，显出明日黄花一般时过境迁的怅惋。因东汉大儒郑玄而扬名的书带草，本为后学儒生仰慕先贤的信物。但陆府的阶前书带草“虽有活意，却毫无姿态了”<sup>⑥</sup>。陆府的景象正暗示出陆三爹这样出身上层绅士家庭的读书人只能苟活乱世，而无力作为。

晚清的变革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如陆三爹一般身处时代骤变的传统正派绅士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失去了掌控地方的地位和能力。“辛亥革命后，传统绅士藉以安身立命的功名、学历和身份等级失去了制度支持和‘合法性’。”<sup>⑦</sup>“民国建立，倡民权平等，绅士曾经拥有的传统特权和利益不复存在。”<sup>⑧</sup>陆三爹本人也早已沉溺旧学，不问世事。出身翰林之家的陆慕游，虽幼承庭训，却

全然没有基本的现代政治技能，连一篇就职讲话稿也要假手于人。传统绅士阶层政治地位的丧失，使陆家这样的簪缨望族也不得不面临着家计逐渐拮据的窘况。曾处于绅士阶层上层的陆氏一门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下可谓富贵皆失。

经历了国民革命中反绅浪潮的矛盾，在《动摇》中以带有偏袒与溢美的笔调塑造了与“劣绅”相对的“正绅”形象。从中我们可一窥出身于中下层绅士家庭的矛盾，对簪缨世家的正派绅士挥之不去的尊崇与敬畏。

在传统社会中，“正绅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又是百姓的楷模”，对传统基层社会发挥着领导、教化的作用<sup>⑨</sup>。伴随着清季民初的社会变革，陆三爹这样的传统正派绅士虽恪守道义，却在客观上失去了参与地方政治的条件，且在主观上也完全隐退于故家旧宅，无心世事。这也正是当时的湖北省“士绅阶级乃退于无能。公正人士，高蹈邱园”<sup>⑩</sup>历史局面的缩影。当正绅退出了基层管理以后，一些品行低劣者开始填补这些空缺。于是，有了胡国光这样假公济私，钻营奔走，危害地方的劣绅充斥于基层社会。

《动摇》中曾煊赫一时的陆家，在新时代中虽失落萧条，却仍充满旧式贵族的才情道德。但陆三爹所代表的传统正派绅士已失落了过往的济世精神与能力。小说对传统绅士阶层上层的细腻刻画，隐隐透露出亲历国民革命动荡局势的矛盾对正绅隐退的叹惋以及对正绅主事的怀想。同时，这部分叙述也避免了作为革命者的现代知识分子和作为反革命者的劣绅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局面。陆府这一门隐退的正绅，失落的贵族，构成了《动摇》所展现的国民革命时期基层社会乱象中一道深邃幽隐的背景，赋予了整部小说历史的纵深感。

当传统正派绅士在现代国家政体下逐渐隐退，新兴政治力量也在其中暗暗生长。《动摇》中作为革命“新贵”的现代知识分子，正是从传统绅士阶层中蜕变而生的。然而，小说中这种民国时期特有的新旧社会精英阶层衍生关系，却长期被阶级立场和党派对立所遮蔽。

《动摇》发表之初，就被左翼文艺阵营批为尽是落后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阶级局限。矛盾当时的自我辩护及建国后对《动摇》的陈述，似乎确证

了其中人物小资产阶级的身份属性。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将《动摇》对革命者的叙述解读为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弱点而面对封建势力反扑时的动摇、懦弱几乎成为了一种常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方罗兰更是历来被指为带有先天阶级缺陷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之典型。这位就职于县党部的革命者还被指为国民党左派,他在革命工作中的失误也被归于国民党左派的右倾动摇。党派或阶级的身份定性掩盖了方罗兰这一国民革命时期青年革命者典型形象丰富的层次性,也干扰了我们对这一小说主要人物的全面解读。

《动摇》中对方罗兰的家世背景有明确交代。时任县党部商民部部长的方罗兰是县城本地人,出身世家。世家即“旧时泛指门第高,世代做官的人家”<sup>⑧</sup>。他的家族与县城内簪缨望族陆家是世交,他的妻子是和他门当户对的贵族小姐。这位青年革命者其实也出身于传统绅士阶层。

小说中一方面暗示出方罗兰的家庭背景与属传统绅士阶层上层的陆府相当,一方面又在书写他与陆氏这样没落贵族的区别。同样是世家,他的住宅已经没有了古色古香,家居摆设一应是新派气象。他的妻子是新式女性,他的家庭是新式家庭,他的职位是在新式政权。在个人生活和革命工作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中,我们所看到的已然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若不是作者刻意点明他的传统绅士阶层出身,我们已经很难把这位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政治精英与传统绅士阶层联系在一起。现代新式教育使传统绅士阶层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清季种种变革催生了“社会结构变动中新知识青年群体取代士绅主导话语的历史进程”<sup>⑨</sup>。“至民国时代废除科举制度后,那些具有科举功名的士大夫则很快被排挤出政府,并被新式学校出身的官吏所替代。在正式的行政权力体制中,新学人士是主体构成。”<sup>⑩</sup>在国民革命时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更是以社会精英阶层的身份成为了革命政府的中坚力量。

现代教育赋予了方罗兰进步的政治观念和现代政治技能。与传统绅士阶层分化出的劣绅将政治变革视为投机营私的契机不同,方罗兰对于革命和现代政治理念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与认同。他对于自己的革命工作,真心地信仰并愿意为之

奋斗。方罗兰虽困扰于个人情感纠纷,但却诚恳地为自己沉溺恋爱、抛荒党国大事感到羞愧。小说虽然表现过他在革命工作中的种种失误,但却从没有叙述他主观上对革命事业的背弃。与纯粹旧学背景的传统绅士阶层缺乏应对新兴政治体制能力的情况不同,方罗兰已经能够在新政体下熟练地完成集会、演讲等一系列现代政治的日常工作,成为县城里有政治实力的正派人士。

在政治活动之外,小说对人物情感生活细腻、生动的表现也历来倍受关注。方罗兰的婚外情也常被视作除革命工作外,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空虚、动摇的又一力证<sup>⑪</sup>。其实,这一情节本身正体现了青年革命者方罗兰思想观念的进步。

在传统社会中,若丈夫对妻子之外的女子动情,则无需产生方罗兰那样的纠结。即便是民国初年,法律也并没有禁止纳妾。然而,方罗兰却无法直面自己对妻子之外的女人萌生爱意。相比之下,劣绅胡国光能自然地游走于妻妾之间,左右逢源。这并不是一个反面人物卑劣之处的体现,而是旧有生活模式使然。方罗兰虽出身传统绅士家庭,却已没有一夫一妻多妾的意识和习惯。现代新式教育和现代社会思潮使世家出身的他摆脱传统旧习,接受了进步的现代婚恋观念。

无论是从职业技能,还是思想意识来看,方罗兰这样出身于传统绅士家庭,并接受了高等教育和进步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都堪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精英阶层。若是抛开国民革命时期的混乱无序局面,方罗兰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应该能够成为常态社会中合格的地方管理者。阶级或党派的弱点和缺陷,显然无法解释这类人物在国民革命中的失败。

诚然,现代新式教育赋予了革命青年参与政治的“合法”身份。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更让他们获得了取代传统绅士阶层,管理地方事务的机会。但是,当革命深入至基层社会时,小说中又透露出这些革命青年所依傍的现代教育背景构成了他们在处理地方事务时的严重局限。

在传统四民社会中,“即使最低微的生员,也会在社会生活中拥有普通人没有的威慑力。士绅与平民不断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中区分彼此,从而共同维护各自在权力关系中的身份”<sup>⑫</sup>。可是,民国初年,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却

失去了通过自身拥有的知识文化资本在基层社会中获得政治资本的条件。相对于传统的科举功名而言,新式现代教育在普通民众中极为缺乏认可和敬畏。

《动摇》中即便是目不识丁的钱寡妇都对前朝簪缨之家的陆氏一门抱有溢于言表的艳羡之情。但方罗兰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民众中却得不到基本的尊重和认同。他虽出身世家,但是住处已经没有了传统绅士家庭高门大户的气势。从小说对他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他与平民阶层的区别。在政治工作中,他也只能依靠激进的革命言论来获得狂热民众的欢呼,且时时有被民众摒弃唾骂的危机。完成了传统绅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换的方罗兰,尽管具备参与现代政治的能力,却已经丧失了传统绅士阶层在民众中的特殊地位与崇高威信。

另一方面,与传统的经学教育不同,这类现代学科教育旨在赋予新一代知识分子适应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职业技能。但这种新的教育背景却使他们疏远了蕴含在传统经学教育中的世情人伦。此外,与分散于乡镇的传统教育不同,新式学校大多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大都市。出身世家的方罗兰,其生活方式和观念已经在接受城市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以耕读为标榜的传统知识分子基本上遵循着在乡间读书,到城市为官,退任后还乡这样的人生轨迹<sup>⑧</sup>。有着这种人生轨迹的传统绅士阶层,与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是有着紧密联系与接触的,所以在管理地方事务时具有很大的天然优势。而新式教育下的知识分子,可凭借自身教育背景在城市中成为工业、学术等领域的精英阶层,但却难以如传统绅士阶层一样自如地管理基层社会<sup>⑨</sup>。

知识背景和生活轨迹的巨大差异,使方罗兰这样出身于本县绅士家庭的革命者在基层社会中极度缺乏民众基础。连在地方政界经营多年的绅士胡国光也一直与他没有交往。在县城发生剧烈变动时,他仍一无所知地走在街道上,可见其在县城人脉关系的缺失。这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具有与基层社会的“血脉关系”,“失却了传统士绅和百姓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sup>⑩</sup>。

过去秉持阶级立场和党派观念对方罗兰这个

人物的解读,漠视了清末民初社会骤变的特殊局面,因而不免对《动摇》中塑造的方罗兰这一革命者形象造成误解。事实上,《动摇》中方罗兰这样的青年革命者,在国民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并不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的阶级属性和国民党左派这样的政治派别所造成的。国民革命失败后陷入悲观、失望情绪的茅盾没有落入之后革命现实主义的窠臼将革命者神化,而是真实描绘了他们在陌生鄙陋的基层社会展开革命工作时的无措与迷茫。

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中,缺乏现代政治技能的正派绅士在国家体制激变的湍流中退居自守;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绅士家庭子弟又在业已陌生的基层社会中水土不服。在这新旧交替之间,一些半新半旧的人物开始在政治权利再分配的乱局中通过投机钻营,逐渐填补了基层社会的权力真空。《动摇》中劣绅胡国光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尽管茅盾自己否认胡国光是《动摇》的主人公,并声称“这篇小说里没有主人公”<sup>⑪</sup>。但胡国光却被评论者认作小说中“作者最着力的人物”<sup>⑫</sup>,他的活动也占据了大量篇幅。即便是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胡国光这一人物形象是国民革命中的典型。

小说在胡国光出场不久就指出了:“这胡国光原是本县的一个绅士。……辛亥那年……他就是本县内首先剪去辫子的一个。那时,他只得三十四岁,正做着县里育婴堂董事的父亲还没死……他仗着一块镀银的什么党的襟章,居然在县里开始充当绅士。”<sup>⑬</sup>这寥寥几笔提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

当胡国光借辛亥革命之机发迹时,他的父亲正做着县里育婴堂的董事。育婴堂在清代却是地方常设的慈善机构,其主要功能是收养弃婴<sup>⑭</sup>。清嘉道以降,中央政府财政见绌,地方绅士力量兴起,育婴堂的建设管理逐渐由地方绅士掌握<sup>⑮</sup>。育婴堂的董事是“‘孝廉方正’、‘老成有德’的一人或数人……由正派士绅接办”;董事作为育婴堂的管理者,都是“品行端方,老成好善,家道殷实之士”,且“只尽义务,不拿薪俸”<sup>⑯</sup>。由此我们可见,胡国光大抵出自一方乐善好施的正派绅士之家,而非一般的地主。

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客观实际还是法律规

定,绅士的声望与特权都是能与家人分享的<sup>⑧</sup>。但胡国光却并非依靠父辈的传统绅士地位,参与基层社会政治事务,而是通过在辛亥革命中的投机行为获得在地方充当绅士的资格。

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大多数以谘议局为中心的各省绅士加入革命行动。“地方士绅阶层不仅是革命光复的主角,也是各地光复的最大获益者。”<sup>⑨</sup>胡国光在小县城的发迹经历,正是地方绅士借辛亥光复之机牟利的真实写照。

与传统绅士阶层凭借声望影响地方社会的情况不同,清末新政及民国以后的绅士阶层主要依靠合法设立的自治组织机构获取权力<sup>⑩</sup>。旧制向新制的转变使原本只站在幕后的绅士阶层在地方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利空间,公开且合法地走上了政治舞台。出身于传统绅士家庭,发迹于辛亥革命的胡国光,在民国初年的地方自治中确立了自身地位,完成了从旧式绅士阶层到掌控地方局面的新式绅士的演变。动荡时局下,胡国光这类地方绅士拥有比政府官员更强的稳固性:“省当局是平均两年一换,县当局是平均半年一换,但他这绅士的地位,居然始终没有动摇过。他是看准了的,既然还要县官,一定还是少不来他们这夥绅士;没有绅就不成其为官。”<sup>⑪</sup>

而《动摇》中全然没有胡国光从事土地生产经营或与农民接触的叙述,反倒是用了相当的篇幅叙述这只“积年老狐狸”在国民革命动乱局势下的政治活动。可见封建地主阶级对于胡国光这类人物是极不适用的。胡国光这一人物所要展现的,是民国初年及国民革命时期,绅士阶层操控地方这一突出的社会特征。

当国民革命的风潮席卷县城,“新县官竟不睬他,而多年的老绅士反偷偷地跑走了几个”<sup>⑫</sup>,他仍留在本地继续自己的“事业”。在国民革命中,他政治活动起点是参选商民协会委员。面对县党部要商人参加商民协会的通知,胡国光的姨表弟、王泰记京货店店主——王荣昌因只会做生意,最怕进会走官场而一筹莫展。可胡国光却仅从他的三言两语中看到机遇,而代替他以店主身份参会。待到当晚,胡国光“已经做了商民协会的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要稍微运动一下,委员是拿得稳的”<sup>⑬</sup>。之后,他迅速拉拢望族子弟陆慕游,以结交本县有势力的正派人士,刺探消息。

仅仅经过几天的奔走,他依靠情面和许以金钱,与自己的“抬轿人”约定好选票投向,拉到了大量选票。

虽然,胡国光终因县党部商民部的调查而被取消资格,但他在此过程中对政治规则的充分了解、娴熟运用,已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当时地方绅士操控选举的成熟现代政治技能。以土地经营和剥削农民为生的封建地主阶级与操控政治的绅士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胡国光参与政治活动的基础——选举权、被选举权及民主选举制度也从来就不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为现代民主社会所特有。

胡国光这位饱经民国初年动荡政局锻炼的地方绅士,其高超的从政“综合素质”还远不止操纵民主选举这样的常规技艺。在革命者们为店员工会与店东的冲突左右为难,局势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胡国光借着一番迎合过激群众运动的革命言论迅速“蹿红”。他这段自称为革命利益愿意牺牲一切的豪言壮语,不仅赢得青年革命者的交口称赞,也让他在围观群众的热烈掌声与欢呼中成了众人拥戴的革命家。

凭借着一次次紧跟革命风向的政治演说,胡国光成了革命新贵。靠着这样的名声和口才,胡国光在县党部改选中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常务。他通过民主选举这样合乎现代政治体制的方式,进入了县一级国民革命政府的核心组织。靠着纯熟老练的政治手腕,胡国光不但摆脱了“劣绅”的罪名,还成了“激烈派要人,全县的要人”<sup>⑭</sup>。

《动摇》生动呈现了地方绅士的政治运作能力、公众演说技巧,及其对地方民众心理和革命运动走势的准确把握。小说中胡国光的政治活动,正是民国初年,地方绅士对新兴国家和现代政治体制具有极强适应性和控制力的生动体现。

然而,胡国光这样出身于传统绅士阶层,并在辛亥革命中完成身份转化的民国绅士,实际上,并非一个“新式”的人物。在个人生活上,他依旧蓄养妾室,不懂得与新式女性打交道。在政治观念上,他也并不认同民国建立后民主与宪政的意义。新的政体不过是新的钻营游戏规则而已:“从前兴的是大人老爷,现在兴委员了!”<sup>⑮</sup>他的一切政治运作都旨在为自己牟利。《动摇》中塑造的这个半新半旧的地方社会实际掌控者,并不是单



纯的封建地主，而是民国初年典型的地方绅士。

胡国光这一绅士形象的典型意义还在于他展示了民国初年地方绅士的突出特征——“劣质化”。“作为社会恶势力，土豪劣绅历代皆有，但成为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却是民国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畸形产物。”<sup>⑤</sup>各地广泛存在的劣绅是国民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旨在表现国民革命现实的小说《动摇》全篇都贯穿着劣绅胡国光在革命中的投机与破坏。

传统社会对于绅士阶层的言行品德有严格规范，除了道德上的约束外，绅士阶层还会受到制度上的管控。“地方官员对有功名身份的在籍绅士，负有督查之责。……绅士如果违反法律或品德低下，将被褫夺斥革，受到严厉制裁。”<sup>⑥</sup>即便胡国光本人心术不正，但在传统绅士家庭氛围和传统社会地方规约之下，他也很难以大奸大恶的劣绅身份长期在地方生存发展。

然而，“民国时期，绅民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法律和制度也不再对绅士阶层的行为作特别的约束”<sup>⑦</sup>。在小说中，绅士胡国光在国民革命之前就有种种劣迹。国民革命期间，进入县党部的胡国光更是假公济私，作恶多端。而他的斑斑劣行却是通过县党部召开委员会议、提出议案、投票表决这样的现代民主政治模式来实现的。之后，他煽动民众情绪，“想趁机会鼓起暴动，赶走了县长，就自己做民选县长”<sup>⑧</sup>。“民选”二字更是刺眼而讽刺。小说结尾部分，他投靠反动军阀，攻打县城机关的血腥暴行，又是民国初年常见的乱象——军绅勾结。

从小说中关于胡国光的叙述来看，我们显然无法用“地主”指称他的身份。胡国光劣绅形象的塑造完全通过其政治活动完成，其中并没有经营土地、剥削农民的任何表述。国民革命时期的文件和其他公开出版物，也都将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作为两个概念在使用。所以，我们不能将劣质化的民国绅士阶层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简单的身份对接。《动摇》中，胡国光赖以生存的现代民主自治体制和现代政治技能都不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实质上，他是民国特殊社会运行机制中，由传统地方绅士阶层演变分化出来的劣绅典型。

### 三

通过回归民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秉持阶级论和党派立场对《动摇》中人物形象的解读，还是以“现代性”对“时代女性”形象与“革命”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阐释，都曲解或简化了小说所极力呈现的社会历史图景。实际上，茅盾在《动摇》中以小县城为时代缩影，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民国初年，激烈分化演变后的传统绅士阶层，在国民革命洪流中不同的人生样态，勾勒出了“绅”的嬗变——这一民国初年典型的社会风貌。像陆三爹一般的正派传统绅士因无法适应新的社会体制，而沉溺旧学、不问世事。如方罗兰这样的传统绅士阶层子弟，通过接受新式教育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但却无法如先辈那样成为基层社会的有力控制者。同时，还有一部分似胡国光者，通过各种投机行为，摇身变为继续操纵地方的民国绅士，并逐步劣质化。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界承继四五十年代昙花一现的“绅士”研究并借鉴国外相关理论成果，开始以中国社会固有的“绅士”这一概念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来考察清季民初的中国社会。国内外的一些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理性地洞察到清季民初，传统绅士阶层的演变分化及其深刻的社会影响。而出身绅缙之家的茅盾，则在上世纪20年代末通过自己真切的人生体验，对绅士阶层的聚变有了丰富而敏锐的体察。

茅盾对绅士阶层的兴趣和关注也并没有止步于《动摇》这部早期创作。之后的《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创作也不同程度地展现着传统绅士阶层在民国社会中的演化、转型与坚守。其实，不仅是茅盾，许多现代作家也都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展示了民国社会中绅士阶层有别于以往时代的生活面貌和心理样态。

鲁迅的小说中就常常直接以秀才、举人、绅士来指称其中的人物。这些小说以平淡的日常细节勾勒出了“绅”“民”格局之下的乡土社会风貌。京派作家中的沈从文、师陀，左翼作家中的艾芜、沙汀等人也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对绅士阶层有细致、独特的表现。



可以说,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形象都可以借助绅士这一概念加以重新解读。对现代文学作品中绅士形象的发掘与阐释,能让我们重新描绘现代文学的人物形象谱系。只有放弃过去以阶级为中心的人物形象界定,寻找民国时期自身的社会分层来观察现代文学,我们才能克服固有政治观念和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误导,从而切实地感受现代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丰富而复杂的历史风貌。也只有进入民国时期的具体社会图景,众多现代作家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才有机会得以展现。

虽然,茅盾在文论中惯于使用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概念,但他的小说创作却常常精细刻画他在理论上不曾涉及的绅士阶层。从茅盾小说中对劣绅这样负面形象的精细刻画,对传统正派绅士执事的美化与怀想以及对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绅士阶层出身的刻意暗示中,我们会发现茅盾对绅士阶层有着满怀兴趣的把握和难以自拔的偏好。

无论是从家族渊源还是个人发展经历上看,茅盾都与绅士阶层密不可分。茅盾的外祖父为当地名医,但“要求正途出身的愿望依旧强烈。五十岁以前,每逢乡试,必然去考”,收门生也要求必须是秀才<sup>58</sup>。茅盾的曾祖父经商之余也抽空读书,还曾靠着捐纳的异途谋得官职。他的祖父虽乡试屡考不中,但也有秀才的功名。茅盾的父亲16岁时也考中了秀才<sup>59</sup>。回忆录中,茅盾多次提及自己的曾祖父希望儿孙辈能够从科场发迹,改换门庭。其中,茅盾还不时透露出对祖辈父辈极富才学,却不肯用心备考而未能高中的惋惜。

从茅盾自己的叙述来看,虽祖辈父辈致力科考而终未中式,但却也未曾从中遭遇身心戕害。他既无中道之家破落后对旧有传统制度的切肤之痛,也无高门巨族在大厦倾覆后的遗老遗少气味。相反,茅盾的家庭和他个人不仅都在情感上如当时的大多数民众一样对绅士充满敬意,也在实际生活中承受了传统绅士的恩惠。

茅盾父母的媒人是镇上名望极高的绅缙卢小菊。茅盾幼年就读的乌镇第一所初级小学也为卢小菊创办<sup>60</sup>。茅盾的表叔卢鉴泉与茅盾的父亲同年应考,取得举人功名。在茅盾幼年和青少年的求学经历中,卢鉴泉给予了各种方式的支持和帮助。

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也得益于卢鉴泉的举荐<sup>61</sup>。此后,卢鉴泉在民国初年商界、政界取得的地位和成就,也无形中为茅盾树立了传统正绅在现代社会成功转型的范例。茅盾在谈及卢家绅士时总是充满感激和敬重。这种对传统正派绅士的好感和尊崇不仅常常在茅盾的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更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为了茅盾对传统绅士行为模式和心理观念的一种近乎无意识的认同和效法。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氛围又进一步强化了茅盾对传统绅士阶层的情结。尽管民国以后,逐步形成的现代政治制度,已经阻断了学而优则仕的进阶道路。但是,传统绅士阶层参与政治权利的强烈济世精神和致力于将知识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的热情却依旧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余温不减。茅盾在回忆录中就谈到:“前清末年限科举办学校时,普遍流传,中学毕业算是秀才,高等学校毕业算是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算是进士,还赐翰林。”<sup>62</sup>这种借助科举功名来理解现代新式教育的背后,无疑蕴含着对文官考试制度的怀恋。而民国建立以后,新学人士逐渐成为政权主体的趋势,似乎又为接受了新式现代教育者展开了“学而优则仕”的前景。

就茅盾个人而言,他不但长期以文议政,而且在具体政治活动方面也有深入的实践。他自1920年10月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后,就长期从事党的工作<sup>63</sup>。在国民革命中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sup>64</sup>,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主笔<sup>65</sup>。有学者从台湾地区搜集的“国民党特种档案”也显示,茅盾对国共两党党务的参与情况,远比学界目前掌握的更多<sup>66</sup>。可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一批党员,茅盾参与政治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是大多数现代作家难以企及的。而从建国后茅盾所担任的政治职务上看,似乎可以说,他以科举仕途之外的道路实现了祖辈几代人改换门庭的愿望。

然而,茅盾终究是传统绅士阶层中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而无法如传统绅士一般圆融知识与政治于一身。茅盾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蚀》一经发表,就被中共视为“退党宣言”<sup>67</sup>。此后,茅盾积极主动地将政治意识渗透于文学创作的努力几乎从未停步。但他的文学作品中满溢

而出的政治思考总是与抑制不住的感性认识相互撕扯。传统绅士阶层参政济世的愿望使他自觉致力于政治思想的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特性又让他不自觉地偏离政治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这种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使茅盾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政治理念与感性认识的此起彼伏、错综纷扰,也导致了茅盾纠缠一生的矛盾。

茅盾身上体现出的政治与文艺的交错纠葛在现代作家中并非其所独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本身就有科考功名在身,现代作家中出身传统绅士阶层的亦不在少数。国民革命爆发以后,大批新学知识分子投奔革命政府、参与政治军事行动,其中就有包括茅盾在内的大批现代作家。革命文学运动的发生以及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和作家的文学选择等文艺与政治的纠缠<sup>⑧</sup>,也都与民国时期绅士嬗变的实体过程和精神形态有关。

只有返回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独特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才能相对贴近茅盾等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发现之前研究所没有关注的信息。也只有尽可能地返回现代作家对自身所处时代的原初感受,我们才能从现代作家微妙心理的蛛丝马迹中探寻其文学创作对人生和世界的观察与解读。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既有社会政治理论的藩篱,回归民国的具体历史事实和社会运行机制<sup>⑨</sup>,体认现代作家纷繁交错的内心世界,切实推进我们对茅盾这样的现代作家更深层次的研究。

- ①茅盾:《英文版〈茅盾选集〉序》,丁尔纲编《茅盾序跋集》,第2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6月北京第1版。
- ②茅盾在回应文坛对《蚀》的攻击时,承认自己所描写的对象是小资产阶级,但又指出面对大革命失败的动摇、幻灭情绪并非小资产阶级所独有。此外,他还强调“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并反驳了革命文学派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否定态度,进而为文艺描写小资产阶级正名。参见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10号;茅盾:《读〈读倪焕之〉》,《文学周报》1929年第8卷。
- ③参见庄钟庆《茅盾的创作历程》,第56—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北京第1版。
- ④刘绶松:《论茅盾的〈蚀〉和〈虹〉》,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下),第547页,知识产权出版

- 社,2010年1月第1版。
- ⑤参见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 ⑥⑨④⑩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138页,第1145页,第1142页,1928年第19卷10号。
- ⑦王富仁:《现代作家新论》,第53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 ⑧参见[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350—3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 ⑩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 ⑪金炳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第33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 ⑫参见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第8页,第66页,第1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2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命运》,第6—1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谢俊贵:《中国绅士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
- ⑬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6—2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 ⑭杨小辉:《传统士绅与知识阶层的近代转型》,《学术界》2007年第6期。
- ⑮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命运》,第1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 ⑯⑰⑱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第282—290页,第301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 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 ⑳《华南时局》(张国焘的报告,1927年1月31日于汉口),转引自[苏]A. B. 巴库林著,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3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茅盾《蚀》,第21页,第22页,第24页,第25页,第23页,第23页,第23页,第4页,第4页,第5页,第12页,第113页,第7页,第129页,开明书店,1941年5月普及本六版。
- ㉑邱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第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2版。
- ㉒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中

- 国绅士续篇》，第324—326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 ②③④⑤⑥肖宗志：《清末民初的绅士“劣质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 ⑦湖北省民政厅编《湖北县政概况》，第1039页。转引自——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 ⑧夏征农等编《辞海》（第三卷），第207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 ⑨王先明：《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 ⑩参见樊骏等著《茅盾的〈蚀〉》（节选自1955年《文学研究集刊》，第四辑《茅盾的〈蚀〉和〈虹〉》，见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第529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 ⑪⑫李涛：《士绅阶层衰落化过程中的乡村政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浙江省为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第1期。
- ⑬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 ⑭〔美〕孔飞力（Kuhn, P. A.）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237—2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 ⑮⑯王先民：《近代士绅阶层的分化与基层政权的蜕化》，《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 ⑰钱杏邨：《〈动摇〉书评》，《太阳月刊》1928年停刊号。
- ⑱⑲万朝林：《清代育婴堂的经营实态探析》，《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
- ⑳参见常建华著《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第316—324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 ㉑魏光奇：《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河北学刊》2005年11月第25卷第6期。
- ㉒⑳㉑㉒㉓㉔㉕茅盾、韦韬著：《茅盾回忆录》（上），第5页；第10—21页；第55—56页；第56—61页，第90页；第60页；第156页；第261页；第280页，华文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 ㉖杨扬：《台湾所见“国民党特种档案”中有关茅盾的材料》，《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
- ㉗陆定一：《大文学家茅盾》，见《陆定一文集》，第8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 ㉘参见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 ㉙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意返回民国历史情境，发掘其中的“机制”，参见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6期等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范智红

